百家文库

记录古往今来世间百态
彰显中华大地万象更新

北宋经学与文学

BeiSong JingXue Yu WenXue

高明峰 著

百家文库

从先秦到清代，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引人瞩目的一道亮色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最具独创性，且居于核心地位的组成部分。总的看来，它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支配性质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百家文库

北宋经学与文学

BeiSong JingXue Yu WenXue

高明峰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经学与文学/高明峰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068-7057-3

Ⅰ.①北… Ⅱ.①高… Ⅲ.①经学—研究—中国—北宋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北宋 Ⅳ.①Z126.274.4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9234号

北宋经学与文学

高明峰 著

责任编辑 张 文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69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7057-3
定 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一

田汉云

近二十多年来，以儒学与文学之关系为课题，从先秦到清代各个时段都有专著问世，相关论文数量亦颇为可观，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引人瞩目的一道亮色。

研究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与文学的关联，兼具本体论与方法论意义。1949 年，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中国文化独创自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并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具有极强度之个性"之首要一点。这一见解符合实际，其中蕴含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值得后学玩索、体认。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最具独创性，且居于核心地位的组成部分。总的看来，它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支配性质。研究儒家文化与文学之关系，涉及中国文学思想、艺术特质的探讨，有助于把握中国文学的思想内核与艺术形态。文学并非儒学的附庸。包括民间作者在内的优秀的古代作家，他们不仅直接或间接地汲取儒家文化的营养，还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研究儒家文化与文学之离合异同，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探讨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儒学对于文学的浸润，属于文学的文化生态及其实际作用的还原研究，这显然是符合学理的学术路径。这种路径，有助于认清文学思潮演进的学术背景，有助于探讨作家文学思想的渊源，从而为考量特定时期的文学、特定作家作品的地位与价值，奠定坚实的基础。

研究儒家文化与文学之关联，第一重点是研究经学与文学之关联。儒家经典是儒家学说的载体，其内涵博大精深，而最为后世看重的，则是先秦时期积累的最为成熟、适用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与伦理思想。刘勰《文心雕龙》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其实是统治者的政治共识，而刘勰则将其推广至文学领域。历代统治者确定儒家学说为主流思想，相应地也就以经学作为官方学术，并依靠政权的力量，通过制度与舆论，保障经典的传习。因此，经学成为备受官方重视的显学与学术文化的主干。经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一是文本考释，二是

义理诠解。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为后者服务。这两个环节都可能对文学家的创作活动产生影响。择要而言,在古代社会,士大夫熟练掌握、灵活运用儒家经典的话语,被看作是古代作家造语雅正的主要特征。恪守并阐扬儒家的思想观点,则被视为思想纯正的主要标志。总之,经学修养被视为文学修养的首要素质。分析、评价经学对于文学的影响,以切合实际、辨析入微为贵。研究者要达到这种学术境界,需要在经学方面下一番功夫。虽说研究文学者不通经学,未尝不能取得成绩,毕竟与许多古作者存在知识与思想上的隔膜,学术视野与认知能力亦因此而受到制约。

在中国文化史上,北宋儒学与文学都占据重要地位,具有显著特色。无论是经典的文本考释,还是义理阐发,都与汉唐时代颇有不同。汉唐经师多遵循由词通道的治学程式,故释经重征实,明理尚墨守。比较特殊的只有《春秋》公羊家。北宋经师则主张义理先行。程颐说:"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其明理,则直指人伦,以道德性命之学为本,并取资于释道之学以立说。至于解经,又不止于扫除章句,且崇尚如程颐所谓"于简策之外脱然有所独见"。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称之为"变古时代",虽然意含贬损,还是指出了宋代经学在内涵与学风上的独特性。周敦颐《通书·文辞》说:"文所以载道。"这大体是宋代诗文作家的共识。宋人诗文形成平易浅近的风格,与经学领域鄙弃注疏的习尚不无关系。关于宋代经学和文学的得失优劣,历来评价不一。大致是崇尚宋学者亦推许宋代文学,鄙弃宋学者亦轻诋宋代文学。这种现象实源于宋代经学与文学固有的紧密联系。

高明峰副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修唐宋文学,对儒家文化已有所关注;攻读博士学位时于经学史用力甚勤,其学位论文以北宋经学与文学之关联为选题,颇能反映学与年进之迹。研究儒家文化与文学之关联,可以有不同的操作方法。不谈古代作家的学术思想与治经实践,径直以儒家的思想理念与作品作比照,这是比较简便的,但是可能流于浅易。设若相沿成习,恐不免形成概念化的流弊,至为通人厌弃。考察作家的治经实践与学术思想,继而探讨其创作与经学之关联,这是较为繁难的,但是唯有如此,才有希望获得真知灼见。高明峰所采取的是后一种学术路径。为了求真而不避繁难,可见其问学之笃实。

高明峰当初选择北宋经学与文学之关联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固然是基于自身的知识结构,但也源于意识到这一课题所具有的特殊价值。陈寅恪先生《邓广铭宋史职官制考证序》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一论断,应包括北宋经学与文学在内。高明峰这部据博士论文充实、修订而成的专著,以北宋文学为本位,考察其与同期经学的互动状况,摒弃空谈,注重实证,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心于北宋诸大家贯通经学与文学的成就与特色。其绍述前贤而追求有所发明之志向，值得称许。至于书中深造自得之胜义，读者自可评品，兹不赘述。

顾炎武《与施愚山书》云，古之经学“非数十年不能通也”。窃以为顾氏所论，系指学人为学臻于精纯境界之难。治古之文学，亦复如是。值此急功近利之风盛炽之际，当三复前贤明训。明峰风华正茂，治学之日正长，谨书此与明峰共勉。

序二

汪　俊

经学是中国的传统学问，其研究对象是儒家典籍。从经学的发生学、研究史的角度看，经学一方面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和绝对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其自身又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作为学术的经学研究，自从儒家经典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传统的四部分类中，经学居于首位，西汉建元五年，汉武帝颁布国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从此《诗》《书》《礼》《易》《春秋》成为经学的基本典籍，儒学遂成官学。汉儒讲究家学，疏不驳注，精于训诂，重章句之学，形成了专门的学问。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学典籍所涵盖的范围，由西汉五经扩为唐代的九经、十二经。至南宋，《孟子》一书升格为“经”，遂成“十三经”，奠定了后世“经学”的基本格局。

宋代经学是经学史上的一个高峰。由于宋前思想界所形成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哲学背景、宋代国力不强的先天不足现实所导致的士大夫空前的忧患意识，宋代士大夫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以求救国济民，目标相同，途径则异。其大要有两途：一是站在政治家立场解经，大一统的正统观念空前强烈，以儒学为正统，尊王攘夷，排抵异端，关注现实，强调事功；二是站在哲学家立场解经，注重心性，推究阐释圣人之道，以图挽救世道人心。其中所显示出的学术转机，已不能简单地用汉代“今文经”、“古文经”学派的不同来解释。后人用“宋学”一词来概称宋代经学，进而指称宋代学术的原因大约在此。

近二十多年来，经学史的研究渐渐趋热，但在历史时段上而言，似乎先秦两汉与清代更较热门，而于宋代则稍现冷寂。就研究角度而言，则多从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着眼，又多关注与文献学、历史学、阐释学、文字学诸学科的联系。至于经学与文学的关联，除零碎的个案之外，则涉及尚少。那么，经学与文学究竟有无关联？具体到北宋一朝，士大夫集文人、学者、官僚于一身，其无论在经学领域或文学领域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两个领域究竟是并行独立发展，还是彼此交缠、互相作用？如欧阳修、王安石、三苏父子等北宋著名文学家，其实在当时也是著名

的经学家，他们的解经著作与言论亦曾在当时社会产生很大影响。而今人研究宋代经学，很少与文学关联，而研究宋代文学，也很少结合经学作整体性研究，这当然是一个遗憾与缺失。辽宁师范大学高明峰博士的《北宋经学与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他在此领域精研覃思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弥补了这个遗憾与缺失。明峰此书博考经籍，高屋建瓴，在理论上对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总体探讨和准确把握，梳理北宋一朝经学发展脉络，揭示其与文学发展的互动面貌和演进规律，探讨了宋人经学新风对文学内容、风格、形式的影响。宋代庆历到熙宁、元丰之际，直至崇宁、大观，社会动荡不宁，纷纷扰扰，党同伐异。政事则有新党、旧党，学术则有新学、洛学、蜀学、朔学，科举则有经义派、诗赋派，文学则是流派相争，呈日新月异、众星灿烂之状。明峰君通过阅读经学史原典，尤其大量掌握北宋历史、文化第一手资料，分析比较、玩味寻绎，书中着重就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二程经学与文学之互动交集和影响，作了较为详细的有价值的探讨，揭示了其文学观和诗文创作中的哲学（经学）因素，虽然尚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但是其求索和挖掘为宋代经学和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因此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明峰君2002年从余读硕士研究生，其好学深思、博览明辨，是侪辈中的佼佼者，二年后师从田汉云先生读博。《北宋经学与文学》就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如今出版问世，我为他感到高兴。明峰君正值壮盛之年，以其勤奋刻苦、明敏聪慧，相信他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目　录
CONTENTS

序一 …… 1
序二 …… 1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经学与文学的联结 …… 1
第二节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状况及其他 …… 15

第二章　中晚唐经学的新风与文学的新变 …… 22
第一节　安史乱后的现状与变革 …… 22
第二节　中晚唐经学的新风与文学的新变 …… 31

第三章　北宋庆历以前的经学与文学 …… 70
第一节　北宋庆历以前的政风、士风与学风 …… 72
第二节　北宋庆历以前的经学与文学 …… 77

第四章　庆历、熙宁间的经学与文学 …… 105
第一节　庆历、熙宁间的经学 …… 105
第二节　庆历、熙宁间的文学面貌与经学新风 …… 130

第五章　熙宁、靖康间的经学与文学 …… 158
第一节　党争、科举与经学、文学 …… 158
第二节　荆公新学与文学 …… 165

第三节 苏氏蜀学与文学 …… 181
第四节 二程洛学与文学 …… 190

第六章 余论 …… 202

附录 以朱熹为例看南宋经学与文学之面貌 …… 207

参考文献 …… 219

后 记 …… 226

再版后记 …… 228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经学与文学的联结

所谓“经学”，指的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包括字句的注解、义理的阐发等。在20世纪之前漫长的社会进程中，经学一直被视为学术的正统，对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直接作用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又支配和制约着诸如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等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谈经学与文学的关联，应当讨论这样三个问题：①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具体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②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而得以实现的；③对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基本看法或评价。由于后两个问题都与第一个问题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们着重对第一个问题作详细阐述，对后两个问题则仅作扼要评说。

关于经学与文学的联系①，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经学对文学有根本性的影响，而文学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受其自身规律的制约；或者也可以说，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受制于经学，要时常迎合经学，又不断地发现、挖掘自身的特质，表现出对经学的疏离和突破。具体而言，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儒家经典（这里主要指“六经”）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被后世视为文学创作的源头，即所谓“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文心雕龙·宗经》）。这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儒家经典本身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如《诗经》在

① 殷绍基撰有《“经学”与文学》（刊于《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一文，较早地对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初步的专门的探讨，颇具启发意义，然主要是探讨了经学与文学关系的主要表现与基本评价，对于经学为何会对文学产生影响，或者说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哪些途径实现的，则未及考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先秦时本称《诗》或《诗三百》，到汉代被确立为儒家经典“五经”之一时，才称为《诗经》，它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诗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类，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思想意义，还运用了赋、比、兴等多种手法，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成为后世诗歌乃至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正是因为《诗经》丰厚的文学性，有的学者甚至指出：“我们与其尊它为‘经’，以道貌岸然的态度去读它，不如把它看作一部上古时代诗歌的总集，一部抒写情感的纯文学读”①，颇有道理，尽管《诗经》所收并非全是抒写情感的作品。再如《尚书》，也称《书》或《书经》，是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正所谓“书，记也，以其为上古所记之史书，故称‘尚书’”②。尽管《尚书》不能算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且佶屈聱牙，历来号称难读，但它却是后世散文的鼻祖，其中有一些较早的又比较完整的论说文和记叙文。如《盘庚》（三篇）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训话，全文重点突出，夹叙夹议，且多用生动的比喻，如盘庚在劝说时“把旧都比作‘颠木’，把新都比作颠木新生的‘由蘖’。他劝告群臣服从王命，要‘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夫务田力穡，乃亦有秋’。他责备群臣以‘浮言’鼓动群众，好比‘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那就无法扑灭。又告诫人民要听他的话，好比乘船，若不好好渡过去，就会有沉溺的危险”③，从而起到了很好的论说效果。而《周书》中的《顾命》则是较有代表性的记叙文，它记叙了周成王临终顾命和康王即位的经过，先写成王对召公等臣子的遗嘱，次写康王即位的礼仪，最后再写臣下对康王的告诫和康王的答词，显得层次清楚，有条不紊。至于其他的《礼》《易》《春秋》以及后来增入的《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也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中的不少篇章无论叙事、抒情还是议论，或简而有法，或生动传神，或辨证博洽，显示出浓郁的文学意味。关于儒家经典的文学性，其实古人早有领会，南朝的刘勰就在《文心雕龙·宗经》中对此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总结：

>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

① 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② 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第46页。

③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5页。

"六鹢",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文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至于根柢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①

另一方面,儒家经典又被视为后世文学发展的源头,从文学体裁、题材、创作手法、风格等方面,都对后世文学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后世各种文体多源于"六经"(或曰"五经"),这在古人早有论列。如刘勰指出:"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② 颜之推也认为:"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③其次,后世文学的很多题材、创作手法、文学风格都取法于"六经"。就拿《诗经》来说,其中所反映出的社会生活的题材,为后世文人所注意,很多被当作语典和事典来使用,其他诸如赋、比、兴的创作手法、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等,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都是极其深远的。倘若文学创作能够"宗经"的话,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刘勰这样指出:"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④而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总结其创作经验时即提到要取法"五经":"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⑤

二、经学作为西汉以来的官方学说,从根本上制约着后世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学作品的批评与接受。易言之,很多文学理论都是基于经学而生成和发展的,而这种理论形成之后又必然会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和接受;或者说儒家经典本身就有文学理论的因素,通过后世学者的阐发、提炼,逐渐成为

---

① 刘勰撰,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3 - 77 页。

② 分别见刘勰撰,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 78 - 79 页和第 1909 页。

③ 颜之推《颜氏家训》,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 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 19 页。

④ 刘勰撰,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 83 - 84 页。

⑤ 童宗说注释,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柳河东集注》卷三十四《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四库全书》本。

指导或制约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理论，略如刘再华所说："经学通过建构与其政治哲学相一致的文学理论，为统治阶级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主动规范文学的发展。结果形成这样的局面，儒家经典本身所包孕的文学思想既理所当然地呈现为一种经学话语，又自然而然地成为后世文学理论发展的源头，明显的表征就是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文论范畴大多数是从经典中抽绎出来的，能够在经典中找到其生成的依据。这些文论观点凭借其载体所拥有的话语霸权地位，在历代作家的创作中得到贯彻和实践。"①

譬如，"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②其后，学者多有解说，互有异同，正如殷绍基所言："由孔子的'诗言志'，而《毛诗序》的'诗言志'，而董仲舒、而郑玄、而王肃、而孔颖达、而程、朱、而顾亭林、而清代朴学大师的'诗言志'，变其本而加其厉，源其远而流益分。"③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诗序》的解说，它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着重强调诗歌干预现实的作用，提出"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正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等观点。由于《诗经》的经典地位，《毛诗序》所提出的"诗言志"的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后世对"诗言志"的解释不尽一致，但诗歌的社会政治功用和教化作用一直被世人所强调，要求诗歌发挥其美刺功能，至白居易甚至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主张。而《毛诗序》中"诗言志"的理论，也深刻地影响到文学作品的批评与接受。典型者如屈原的《离骚》，正如司马迁所说，《离骚》乃是幽愤之作，所谓"盖自怨生也"，它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赞誉；而班固则对屈原其人其文多有批评："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昏、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④无疑，班固的这种批评，与《毛诗序》倡导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风教"观念是颇有关联的。再如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文以明道"，也对文学创作和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所谓的

① 刘再华《论经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2004 年第 3 期。

② 此据《今文尚书》，伪《古文尚书》将《尧典》下半篇分出，并加二十八字，题作《舜典》，见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和《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正义》。

③ 殷绍基《"经学"与文学》，《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1 期。

④ 王逸《楚辞章句》卷三《班孟坚序》，《四部丛刊》本。

“文以明道”,就是说文章要体现圣贤之道,也即“原道”,正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明道”或曰“原道”,往往与“征圣”、“宗经”联系在一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典籍的重要性就为人们所认识。孔子将之删定作为传授门徒的教材。荀子亦对《诗》《书》等经典作了高度评价:“《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他强调要学习这些经典:“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①,并进而主张辨说要合道,学道和言辞要以圣人及其经典为准则,从而树起了所谓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旗帜:

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明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②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道”字据刘台拱的意见增补)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③

其中“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云云,提示了辞、说、心、道相贯通的路径,其要求言辞、辨论合乎道的意图是极为清晰的,而这个道尽在圣人,尽在《诗》《书》《礼》《乐》《春秋》等经典之中。尽管荀子强调合道是就辨说而言的,而非专门谈文学创作,但从言辞到作文,其间的距离已不甚遥远。其后,董仲舒、扬雄等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直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列《原道》《征圣》《宗经》三篇,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大力倡导“原道”、“征圣”、“宗经”的主张,才更直接、更深刻地对文学创作和批评产生影响。尤其是唐宋以来,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展开,“文以明道”、“文以贯道”、“文以载道”等概念纷纷提出,出现了一批“贯道”、“载道”之文,程颐等人甚至为了强调学道而废除文学,提出了所谓的“作文害道”,而韩愈的文、杜甫的诗,尽管享有盛誉、极受推崇,也遭到了某些人的苛责,如:

---

①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7页。

②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81页。

③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84-85页。

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①

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②

对于这些，应该说都是在“文以明道”的观念制约下出现的。

三、文学的发展、演变，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经学的影响，但又离不开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尽管经学对文学具有根本上的制约作用，但经学与文学毕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面对的对象、研治的路径、承担的作用等都不尽相同，因此，文学的创作与批评既表现出受制于经学的一面，又有着疏离、反拨经学的特质。当然，这与经典阐释自身的开放性、模糊性也有很大关联。所以，我们在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历史上可以看到，既有大量的言志、明道的作品，又有不少的言情娱性、吟风弄月的创制；既有“诗言志”、“文以明道”等体现经学特色的理论，也有“诗缘情”、“以文为戏”等富于文学特质的主张。这里，我们就以有关的文学理论来作一说明。正如上文所说，“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但从其语境来说，“志”的含义是较为模糊的，孔子对于《诗三百》有一个基本看法，即“《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其后《毛诗序》更加强调道德规范，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又有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诗言志”的“志”被逐渐强调成符合道德规范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在《毛诗序》中，又有这样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就为“诗缘情”的主张留下了足够的阐释空间。早在汉代初年的庄忌，就在《哀时命》中提出了“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③，魏晋以来，人们对诗歌抒情的特质认识得越发充分，“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理论主张开始提出并得以张扬，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了后人对经典的阐释。孔颖达在解经时就对“志”与“情”加以糅合，他说：“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情谓哀乐之情”④，甚至明确地将“情”“志”合一：“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

①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十四《韩子》，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2页。

② 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9页。

③ 祝尧《古赋辩体》卷九，《四库全书》本。

④ 毛亨传、郑玄注、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异耳。”①于是,“诗缘情”的理论主张得到了经学的庇护,与“诗言志”一起成为了两条重要的诗歌理论,其内涵也在后世的发展中不断得到丰富。至于“以文为戏”的主张,早在扬雄那儿就已初见端倪,据《汉书·扬雄传》记载: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

这里把赋比作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已有“以文为戏”的意味,尽管扬雄是以之贬低甚至否定辞赋创作。② 其后,“以文为戏”现象代不乏人,如宋人黄彻即指出:“子建称:孔北海文章,多杂以嘲戏;子美亦戏效俳谐体;……自东方生而下,祢处士、张长史、颜延年辈往往多滑稽语。大体材力豪迈有余而用之不尽,自然如此。”③但在理论和实践上自觉地倡导“以文为戏”并影响深远的,则是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通常把他创作的《毛颖传》看作是此类作品的典范。正如王柏所指出的:“托物作史,以文为戏,自韩昌黎传毛颖始。”④洪迈《容斋随笔》卷七“七发”条亦载:“(韩愈)《毛颖传》初成,世人多笑其怪,虽裴晋公亦不以为可。惟柳子独爱之。韩子以文为戏本一篇耳(笔者按:即指《毛颖传》),……”对于韩愈“以文为诗”的做法,在当时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些极力维护儒家礼教、主张“文以明道”的士人纷纷给予批评或指责。如裴度即在写给李翱的书信中对韩愈此种做法大为不满,并告诫他人切勿仿效而是应该严加防范:“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⑤就连颇受韩愈赏识的门生张籍,也专门致书二通以示劝谕,其《与韩愈书》即劝说韩愈作孟子、扬雄那样的明道、载道一类的著

① 左丘明著、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455页。

② 梁德林亦撰文指出:“《古文苑》所载扬雄《逐贫赋》有‘子云自序’云:‘此赋以文为戏耳。’这当是‘以文为戏’说的最早出处。”(见梁德林《韩愈“以文为戏”论》,《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当然,从创作实践来看,早在《庄子》一书中,就带有大量“以文为戏”的成分,正所谓“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

③ 黄彻撰,汤新祥校注《碧溪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④ 王柏《鲁斋集》卷十四《大庾公世家传》“后记”,《四库全书》本。

⑤ 姚铉编《唐文粹》卷八十四《寄李翱书》,《四部丛刊》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